

紫毫挟风雷 丹青写精神

——《温树森书画集》序

□彭 图

温树森是原平市温东社村人,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原平市老年新闻文化学会顾问。他天资聪慧,从小酷爱书画艺术,盘桓在笔砚间,习字临摹。20世纪60年代,他考入晋北文化艺术学校学习美术,师从著名画家李江鸿,在校期间即有书画作品不断问世,先后在《山西日报》《山西群众画报》等报刊杂志发表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漫画40余件,并为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故事《火烧阳明堡》《夜袭中庄》配插图。由于成绩优异,他被中央美院接收为四年级应届毕业生,书画境界逐渐入佳境。多年来,温树森为省内外寺庙书碑60多通,设计制作书画栏1000余米,书画屏800余件。2021年参加“墨绘江山杯”书画大赛得第一名,获特等奖。

温树森的作品深受书画爱好者喜欢,有名家看了他的字画后特赠对联一副——“紫毫挟风雷,丹青写精神”,此为先生书画作品之绝妙写照。《温树森书画集》收录其多年书画作品精粹,包含人物画100幅、书法55幅。温树森的人物画,上承五代宋元时期人物画传统,下融近代连环画技法,以山水笔法描绘人物,以淡雅为主色,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笔随意到,形象生动,极具个人风格。他的人物画中有不少是为普通劳动者画像,显然是从写生而来。温树森深知

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同时又不拘泥于古法,积极吸收西画的写实技巧和色彩运用。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韵味和意境营造,同时也能感受到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和光影效果。这种融合使得其人物画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富有时代感染力和艺术魅力。

温树森曾介绍,他写字开始学王羲之,后临摹米芾和王铎。从温先生书法中可看出,他深得米芾浑厚爽劲之风与王铎放而不流之趣。刘熙载《艺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即后世所说“书如其人”“画如其人”“诗如其人”。

我从小爱看连环画,在上初中时就知道温树森先生大名,初中毕业后,我在村里画炕围糊口,也曾有过当画家的梦想,对当时原平的几位年轻书画家的作品非常关注,可惜却从未与先生谋面。直到2023年,原平老年新闻文化学会聘我为顾问,才第一次与已耄耋之年的温老相见。我与先生为同川老乡,几次交往,相谈甚为投缘,互相加了联系方式,后来先生说要出书画集,嘱我作序。说来惭愧,在书画上我只是个未入门的工匠,也曾为友人出书画集作过序跋之类,但毕竟对书画知之甚浅,既然老兄相托,便只能勉力为之。

是为序!



温树森绘画作品

花团锦簇五千年

□罗茜尹 司志文

每个中国人一定都在锦绣河山、繁花似锦、锦上添花的语境里通晓了“锦”的华美。偶尔不免会想,为什么是“衣锦还乡”,而不是“衣绣还乡”呢?从时间来看,绣与锦的出现可能相距甚远。从文献上看,先秦有《尚书》所载关于“绘绣”的篇章,西汉则有贾谊《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的记述,而“衣锦还乡”却是《旧唐书》里的典故。虽然《诗经》中早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的描述,但在物证里,锦的花纹尺度真正与绣相媲美确实要在隋唐之后。从工艺技术上看,绣的出现和史前人类缝缀衣服的工艺息息相关,而锦却是在中国人发现并获取了丝线的背景下才逐渐发展的织物类型。相较于更易自由装饰的绣,我们从锦中更能看到中国古代衣饰发展的历程。

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坐标。由此,我们能较为直观地看到中国衣饰的审美旨趣与手工技艺的发展逻辑。这里出土刺绣的花纹尺度巨大、配色活泼,虽仅使用锁绣技艺,但其纹样装饰独一无二。与

之相对的是,这里出土的织锦不仅尺度、用色等均有限,花纹也因过于几何化而显得稚拙。

在锦的历史证据出现之前,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麻、毛纤维织出多种织纹肌理,如平纹、斜纹等,此时中国也有了发现蚕桑的最早证据。到了商周时期,人们主动种桑养蚕,已不再满足于绌(斜纹丝织物)、罗(绞经网孔丝织物)、绸(平纹丝织物)、绮(单色花纹丝织物)的“素面朝天”,开始追求起“萋兮斐兮”的锦了。

任何工艺技术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隋唐之前,即便是看起来挥洒自如的刺绣,主要针法也仅锁绣与打籽两种,它们的源头是缝纫的锁边工艺(锁绣)与收针的打结技法(打籽)。与今日大家所熟悉的以平针为主要针法的刺绣相比,锁绣与打籽的表面肌理较为粗糙。古人是不是因为早期绣纹“粗糙”而追求锦纹的发展?我们不能确定,但可以知道的是,从中国人使用蚕丝开始,丝与织就开始了彼此成就的历程。

中国先民最初使用麻、毛纤维进行交

织,用手梳理经线并穿引纬线是一种常态。但对于纤细的蚕丝而言,手经指挂的操作极易损伤纤维,因此可以说,是蚕丝的特质成就了中国古代织造技术的全面发展。《列女传》中指出,春秋时织机的基本部件都是为了适应蚕丝的纤细而发明的。极具规范的部件、高精高效的生产,对手工业时期的人们有极强的吸引力。锦的纹、色发展也就在丝与织的彼此成就中逐渐成熟。纵观织锦史,我们会看到一条在织纹尺度上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线条,而织纹从小变大是必须经历的技术过程。

在古人的观念中,以德行来分辨人之高低是受到认可的,人穿的衣裳成为“报功章德”的最佳载体。可以说,越是身着明显的花纹装饰,越表明此人德行能够顺应天地,于是有了帝舜“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的衣纹理念。先秦的纹样以礼仪或崇拜为主,汉代将祥瑞的观念引入织物,魏晋之时强大的丝绸贸易

为织锦带来了舒展的“花开富贵”……经与纬的交错,花与色的相彰,纹与形的舒展,是织锦纹样比刺绣加工更“天然”的优势。织锦技术发展至隋唐,扩大了织纹的尺度面积,拥有了更易显“贵”的资质,于是,在盛唐才有了“衣锦还乡”的体面,甚至出现了宋之问以文采“夸”锦的佳话。

随着生产力发展,更多的人间繁华景象在织锦上呈现,不仅有花卉、楼阁,甚至生活日常也成为装点衣裳的纹饰素材。隋唐以后,锦、绣在装饰上日趋统一,人们既爱锦的华贵,也喜绣的灵动,民间的衣着与审美有了更大发展空间。更有趣的是,明代诏令之中,常出现对衣着色彩、纹饰的制约规定,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间织锦业的繁荣与发展。也正因此,明代发展出了花纹单位长逾十米的定织衣料,它们以“织成”闻名,比今日所说的“高级定制”要更为耗工费时。

衣锦,以衣之纹彩,彰人之德行。它团花簇拥,既是德慧兼备的象征,也是时代旨趣的体现。

漫谈琵琶

□邵 新

琵琶素有“民乐之王”和“弹拨乐器首座”的雅称。据传琵琶最早称为“批把”,因弹拨手法而得名:向前弹出去叫“批”,向后挑起来叫“把”,后以其制作材料为木类而改作“枇把”。

关于琵琶最早的文字记载,是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批把,谨按:此近世乐家所作,不知谁也。以手批把,因以为名。”比应劭稍晚的刘熙在《释名·释乐器》中写道:“枇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说明琵琶在此时比较流行。直到魏晋时期,人们才把“枇把”改为“琵琶”,归为琴瑟之类的乐器。

琵琶的外形颇具特色,有不少东西因形似琵琶而得名。比如水果枇杷“因其叶似琵琶而得名”;鸡腿的小腿部分因形状像琵琶而得名“琵琶腿”。以乐器来为物品命名,这还是比较少见的,可见琵琶长久以来在民间是有着较高知名度的。

琵琶还与蝎子有着较深的缘分。《西游记》中有一个蝎子精,住在琵琶洞里。在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还给她增加了一把原著中所没有的琵琶作为武器,让人印象深刻,人们甚至直呼她为“琵琶精”。原著中,蝎子精被昴日星官降伏后现出原形,本相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

事实上,用琵琶大小来形容蝎子是有传统的。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亭子不能住人,谁住进去就会死,一个会法术的书生发现亭子里有老公鸡、老母猪和老蝎子三个怪物,于是将他们杀死,从此亭子便安全了。在杀死蝎子时,书中说蝎子像个大琵琶:“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也提到



一。在长期的观察中,人们发现琵琶和蝎子很像。直颈琵琶一头细长一头圆宽,形似蝎子,琴头处两侧的琴轴也颇有几分像蝎子腿,而曲颈琵琶翘起来的琴头则像蝎子尾巴。

琵琶还是佛教的法器。佛教护法天神“四大天王”中的持国天王非常与众不同,其他天王都是拿着刀剑等,他却抱着一把琵琶,因为他也是乐神,用音乐来感化众生。作为法器的琵琶并非外来,而是本土文化产生的。据说持国天王原型为把刀持矛,元代曾换作琵琶,明清时又将其琵琶与广目天王的紫金龙调换。之所以在诸多乐器中选择琵琶,相传是因为此二字隐含着“四大天王在上”之意。

南北朝时,琵琶还是文人彰显高贵身份的标志。南朝琵琶经常为声乐伴奏,声乐的音乐即魏晋时代开始出现的“新声”,文字多是流行于民间的曲词,或是文人创作的古诗。彼时能为琵琶弹奏新声,是士人的一项颇为值得炫耀的技能,刘宋时撰写《后汉书》的范晔因为有这项才艺而备受推崇。宋文帝希望他弹奏一曲,不好意思明说,便暗示他:“(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从中可以看出,南朝琵琶是歌唱时上佳的伴奏乐器,而范晔无视宋文帝暗示,姿态倨傲。“上歌既毕,晔亦止弦”,说明歌止弦亦止的伴奏法是反常的,是范晔不愿配合伴奏作出的姿态,正常的伴奏应当是歌唱结束后,琵琶的乐音在其后慢慢结束。

在《世说新语》中也不乏琵琶的身影:“仁祖(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关于东晋名士谢尚演奏琵琶,《乐府诗

集》中还有一段记载:“谢尚为镇西将军,尝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市中佛国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市人不知是三公也。”从中不难看出,士人优雅弹奏琵琶所体现出来的魏晋风度。

唐代的琵琶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奏,都少不了其身影,琵琶的乐队领奏地位也是在那时奠定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生动描绘了琵琶演奏场景和其音乐效果:“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录了当时著名乐师康昆仑与段善本琵琶斗乐的事。此事发生在唐德宗贞元年间,当时长安大旱,设坛祈雨,东、西两市分别请琵琶大师段善本与康昆仑在长安天门街弹琵琶斗乐。在这场民间祀神赛中,弹琵琶是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可以看出,琵琶承担了娱乐神人的功能。两人一为宫廷琵琶名手,一为寺院中的僧人,所奏乐曲皆是当时民间流行曲目。

此外,琵琶还被用于占卜。据学者研究,唐中宗时期,琵琶占卜已是一项专门化的职业活动,出现了以琵琶算命的“师婆”。琵琶作为卜器参与民间占卜,承担了请神、获得神谕的功能,用于占卜吉凶、求算仕途。李贺长诗《恼公》云:“跳脱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时应七岁,夫位在三官。”该诗记述了一位女子通过琵琶卜算丈夫仕途之事。可以说,在唐代社会,以“琵琶道吉凶”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弹奏琵琶以娱神,既与传统“乐感天人”的认识相通,还与南北朝以来民间以琵琶歌舞“种种伎乐供养佛”的认识密切相关。

怀着激动心情收到期盼已久的山西大学录取通知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山西大学图书馆的钟楼建筑,扉页是书法大家姚奠中先生的校训题词:“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在山西大学校园里,更是处处可见姚奠中先生的书法真迹,图书馆中也能读到他的很多著作,如《中国短篇小说选》《中国古诗文讲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稿》《文史论述》等。

姚奠中和尤敏合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选》,由茅盾先生手题书楣。此书收录我国从古至今众多名家的优秀短篇小说,具体分为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展示了中国短篇小说发展的全貌。古代部分有16篇,如《干将莫邪》《柳毅传》《灌园叟晚逢仙女》等;现代部分有17篇,如《林家铺子》《分》《出奔》等。古代部分既注重有进步意义和代表性的佳篇名作,又注重主题和写作方法的多样性;现代部分则要求思想性、艺术性兼具,有一定借鉴价值,同时避免与已出版的现代短篇小说选本重复。该书对每个作家的生平并不作全面介绍,而是聚焦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道路,作品介绍力求做到文字简明扼要、准确生动。

《中国短篇小说选》第一篇就是东晋干宝所著《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作者用简洁的语言表现斗争过程,写法继承了《左传》《史记》的特点,可谓中国小说发展初期的一篇佳作。干将和莫邪这雌雄二剑如今还经常成为电影、电视剧和游戏中的元素。《林家铺子》是茅盾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讲述了林家杂货铺的林老板在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的环境下艰难维持生意,最终却走向破产的故事。小说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主题深刻,内容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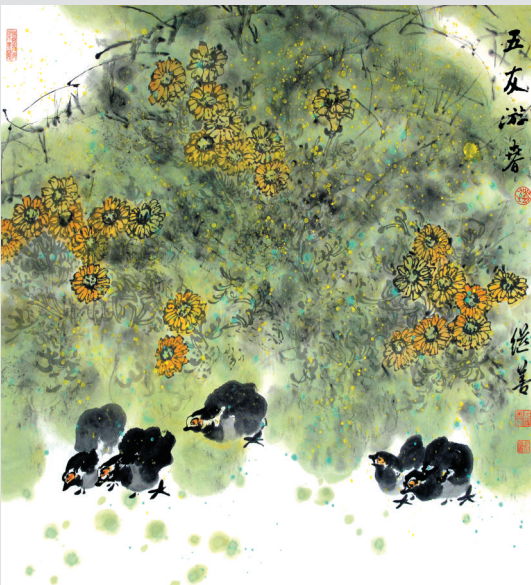
姚奠中,山西运城人,著名的国学大家、教育家、书法家。1935年师从章太炎研究国学,为章太炎晚年收录的7名研究生之一,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江苏、安徽、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各高校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讲授文学史、通史,还涉及诗、词等方面。姚奠中的书法金文、篆、隶、行、楷皆备,以行、篆为主,兼事绘画和治印。书法多写自作诗,风格雄浑豪放,气势磅礴,和画、印一起被称为“四绝”,深受大家喜爱。

从短篇小说的发展趋势来看,如今越来越多作家都开始专注于微观化、内心化的叙事表达,尤其是对日常生活中内心情感变化的精妙书写。阅读《中国短篇小说选》能够感受到,无论现实如何变化,最终都会转化为人们内在的生存感受。本书通过特定情境或特定故事的演绎,反映尘世间的浩波巨澜,这既是文学表达的一种策略,也是短篇小说的特质。希望当下年轻人多阅读类似《中国短篇小说选》的作品,一路攀登、一路学习。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胜不骄、败不馁,砥砺前行,不懈追求,贡献青年力量。

——读《中国短篇小说选》

□李浩冉

画镜



邵继善 作